

A Kissinger Restored

重新思考基辛格

周一骏 著



时事出版社

A Kissinger Restored
重新思考基辛格

周一骏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新思考基辛格/周一骏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80232-775-7

I. ①重… II. ①周… III. ①基辛格, H. A. —人物研究
IV. ①K837. 1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9668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7.5 字数: 265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在60年前的1954年，基辛格在哈佛大学取得了他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为“*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一个甲子之后的2014年，我的学生周一骏也顺利通过答辩并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一骏的博士论文题为《重新思考基辛格》，英文题为“*A Kissinger Restored*”，这也算是一位国际关系领域的晚辈对前辈的一种致敬。也许是一种巧合，就在一骏让我为他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作序的时候，基辛格博士又继续深入了60年前他自己在博士论文中的一些思考，出版了新书“*World Order*”（世界秩序）。

基辛格博士比我年长28岁，1991年1月，我俩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初识，而其实我第一次听到基辛格这个名字还要回到43年前的1971年。1971年7月15日，我正在江西省铜鼓县二源人民公社江头大队当农民。我在盛夏赤日炎炎的稻田里忙着抢收抢种，突然广播站喇叭传来了播音员的声音，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广播的内容：“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于1971年7月9—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据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在适当的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在这一则新闻广播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就以准备尼克松访华为由，开始准备恢复当时已被中断的大学招生。1973年春，国家开始大规模恢复高考教育和招收工农兵学员，我也就此进入

上海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学习，开始今后国际问题研究所需的外语学习。光阴荏苒，在此后的岁月里，我多次与基辛格会面，其中有几次令我记忆犹新。2008年10月29日，我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身份邀请基辛格在锦江小礼堂共论天下大事。考虑到他日程很紧且年事已高，会后本来只安排他同在场外等候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合影，但他看到数十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顿时来了精神，主动提出与大家互动交流。在交流中他告诉研究生们，研究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基础是历史和哲学。

一骏比我年轻30岁，他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又成为我的博士研究生。2011年，在与他一起商讨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我给他定下了基辛格战略思想研究的大方向。经过三年的努力，2014年3月他终于将厚厚的一叠初稿给我，并在我办公室的窗台边给我阐述他的论文要点。不论这篇论文的观点如何，这都是一篇富有创新精神的论文。一骏并不满足于完成一篇基辛格战略思想的综述，而是想尝试着在更宏大的视野下思考基辛格。他告诉我，他写这篇论文的最根本目的，其实并不是验证基辛格是现实主义或非现实主义，而是借用基辛格研究的这一机会，提出这样一个思考：在基辛格撰写《核武器与外交战略》的年代，人类进入了原子能时代并第一次拥有了“过剩的能源”。从此，外交战略的核心不再是追求更多的物质力量，而是“如何巧妙审慎地利用它们”。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人类技术能力的另一个侧面——通讯技术，又将人类思想交换的物理障碍一一清除。旧的思想范式已不能解释原子能和现代通讯技术下新的社会现实。因此，在技术现状这一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发生了巨变之后，如果我们还继续用修昔底德时代、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凡尔赛-华盛顿时代或是雅尔塔时代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关系理论来思考未来的中美关系，是否是一种止步不前？

一骏的这一思考给我一定的启发，10年以前的2004年，我在编写《大合作：变化中的世界和中国国际战略》一书时在序言里写道：“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1500年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伴随着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环球远航探险，人类历史改变了以往各民族相对平行的发展史，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和世界视域”。马克

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最璀璨的部分是他深刻洞见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拓展到国际关系领域，当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崭新的数量级的时候，国际关系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核武器加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人类社会从未如此的复杂分工与相互依存，也从未如此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在这样的时代，如果中美两国继续用上个生产力阶段的思维定势和历史经验来思考未来，就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新的生产力现实呼唤新的智慧，2011年6月27日，在纪念基辛格秘密访华40周年的研讨会上，我提出增加中美互信的三个互相，即在双边问题上互相尊重，在地区问题上互相包容，在全球问题上互相尊重。会后，基辛格特意问我要了讲稿。

2012年1月16日，一骏陪我参加《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暨中美“二轨”高层对话第三次会议》。茶歇期间，我向89岁的基辛格博士介绍了我的这位学生。我始终认为，帮助年轻人拥有这种现场参与感是很重要的。我告诫我的学生，这不是日后炫耀的谈资，而是对今后工作的鞭策。基辛格31岁获得博士学位，一骏32岁获得博士学位。在取得博士学位并留在哈佛大学任教三年之后，1957年，基辛格出版一本奠定了他在决策圈地位的著作《核武器与外交政策》，文中基辛格初生牛犊不怕虎，直接批评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应对苏联的大规模报复政策的缺陷，而新创出“灵活反应”策略。又过了两年，1959年基辛格获得终身教授职位。在我帮一骏撰写序言的时候，他受到大卫·兰普顿教授的邀请，前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位于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保罗·尼采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进行访问研究以完善他的论文。我希望这篇博士论文不是一骏学术生涯的终点，而成为他服务这个蓬勃发展的伟大国家的新起点。

杨洁勉

2014年10月10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1)
二、研究现状综述	(4)
三、研究方法和结构安排	(21)
四、研究的创新与局限	(24)
第二章 基辛格外交思想的现实主义定位及其检验	(27)
第一节 现实主义的主要范式	(28)
一、现实主义的三种不同含义	(29)
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范式及其非对称性	(31)
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遭遇的道德评判及其反击	(37)
第二节 基辛格外交思想的现实主义定位及其说服力	(45)
一、基于政党政治的道德评判	(45)
二、基于苦难的人生经历	(49)
三、基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表面特征	(50)
第三节 现实主义的理论硬核	(53)
一、现实主义的本体论	(53)
二、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说	(56)
第四节 基辛格外交思想既有定位的检验	(59)
一、单一国家假说的检验	(60)

二、理性国家假说的检验	(65)
第三章 基辛格外交思想再定位	(79)
第一节 基辛格外交思想与建构主义的联系	(79)
一、在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	(81)
二、基辛格外交思想与建构主义的相似观点	(89)
第二节 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选择性双重本体论	(93)
一、基辛格外交思想的特殊性	(94)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进化特性：适应人类技术现实	(96)
三、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选择性双重本体论	(101)
第三节 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有机体系	(110)
一、(国际) 外交思想关键：建构对方意识	(110)
二、(国内) 外交决策关键：实现自己意志	(112)
第四章 基辛格外交思想实践：不变的本质	(118)
第一节 对苏战略不变的本质	(118)
一、“有限战争”战略的本质：建构新的游戏规则	(120)
二、缓和政策的本质：驯良革命国家	(126)
第二节 对华战略不变的本质	(140)
一、中国的双重身份：五千年的中国还是现实的中国	(141)
二、归纳中国的价值观基因	(142)
三、验证中国的价值观基因	(146)
第三节 越南战争的本质：人心之争	(148)
一、越南之内的人心之争	(148)
二、越南之外的人心之争	(152)
第五章 基辛格外交思想溯源：时代·人生·学术	(154)
第一节 时代背景：被忽略的技术现实	(154)

一、物质权力的瓶颈：核武器	(155)
二、意识流动的通衢：现代交通、通讯、媒体	(157)
三、现代社会的脆弱性与相互依存	(160)
第二节 人生经历：被臆测的人性观	(164)
一、德国（1923—1938年）：童年时代并非只有黑暗	(165)
二、纽约（1938—1943年）：“移民生活”而非 “难民生活”	(171)
三、两位老师：性格特征与价值观共性	(176)
第三节 学术偏好：被误读的哲学观	(180)
一、被遗漏的康德	(180)
二、被标签化的梅特涅	(184)
第六章 结论	(191)
第一节 本书的主要结论	(192)
一、国际部分	(193)
二、国内部分	(195)
第二节 结论引发的思考	(195)
一、中美关系的未来	(196)
二、人类的未来	(197)
访谈者名单及简介	(198)
附录 1 基辛格在政协的演讲（1996年9月4日下午）	(202)
附录 2 基辛格为《朱镕基讲话实录》英文版所作序言	(211)
附录 3 基辛格访问复旦大学时的演讲与回答提问 （2013年7月2日）	(214)
附录 4 基辛格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讲话	(217)
附录 5 亨廷顿与基辛格	(220)

附录 6 中美关系的未来——有冲突但并非必然 (243)

参考文献 (252)

后记 (266)

第一章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所处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科学的发展使这个时代的物质现实与之前的时代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基辛格外交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试图为这个时代的崭新的物质现实创造出合适的外交思想。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指出，科学和思想的进步实际上是范式（Paradigm）的替换过程，当旧的范式不能解释新的事实时，那些更有解释力的范式就取而代之。^① 在人类发展上，科学的进步可以让人类拥有更多的物质能力，而思想的发展则帮助我们了解如何驾驭这些物质能力。但科学与思想并不总是同步发展的，现实情况是它们往往交替领先。在有些历史时期，人类思想的进步超越了科学的发展，于是人们苦于物质的匮乏；而在另一些时候，科学的进步超过了思想的发展，于是人们困于过剩物质力量带来的纷争。无论是科学落后还是思想落后，都会造成世界的动荡。比如印刷术导致的信息与知识的传播速度与广度的革命，“就导致了两个世纪的动荡岁月，因为人类的观念以及政治和宗教机构需要时间来吸收由此产生的变化”^②。在我们所处的人类历史的这个短暂片段上，科学取得了具有

①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② 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s A New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70. p. 327.

里程碑意义的突破。爱因斯坦的量子力学理论，突破了牛顿的经典力学理论，科学的这一进步使人类进入了原子能时代并第一次拥有了“过剩的能源”。从此，外交思想的核心不再是追求更多的物质力量，而是“如何巧妙审慎地利用它们”^①。而与此同时，人类技术能力的另一个侧面——通讯技术，又将人类交换思想的物理障碍一一清除。基辛格认为：“我们处在一个知识和政治开始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相比印刷术的发明，范围更广泛，演变更迅速”^②。旧的思想范式已不能解释原子能和现代通讯技术下新的社会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基本变量已经改变，无论是基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还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实的国际政治理论，这些发生在核武器与新通讯技术时代之前的理论对今天的国际政治的解释能力和借鉴意义都是有限的。于是，一系列新的思想和理论应运而生。基辛格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他从一个外围的学者，得以走向战略决策的中心地带，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他以《核武器与外交政策》、《选择的必要》、《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等理论著作为基础，建立了一种基于核时代新的人类社会现实的外交思想。

但是，目前国内外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将基辛格视作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却鲜有学术文章论述或证明为什么将基辛格外交思想视为现实主义。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下，存在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完全用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作为认知框架来理解基辛格的外交思想。这种认知方法一直面对着三个方面的困境：

第一，仅用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基辛格外交思想的研究框架是否合适。基辛格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一位国际政治学者，他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研讨班的组织者、《融合》（*Confluence*）季刊编辑（1952年）；1954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历任讲师（1954年）、终身副教授（1959年）和终身教授（1962年）。

^① [美] 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0页。

^② 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s A New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2001. p. 328.

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实践者。1969年1月—1975年11月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年9月—1977年1月任美国第56任国务卿。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美国陆军970反情报部队中士，在德国执行任务。鉴于基辛格学者与实践者的双重身份，与罗伯特·基欧汉、肯尼思·沃尔兹等职业教授不同，基辛格的志趣并不在于形成精致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而是指导外交实践。他的外交思想虽然缺乏学术意义上的系统化，却也从未囿于纯学术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之内。更进一步，基辛格深刻认识到，增加绝对实力是政治家的任务，不是外交家的特长。外交的本质就是发挥对对方意志的影响。作为一个外交实践者，他无法改变短期内美国的物质性实力，只能在观念层面发挥创造力（不论是在自身还是在对手身上）。鉴于以上基辛格身份的复杂性，用纯学术的国际政治理论来解读基辛格，是否会遗漏甚至误读他的外交思想的某些重要部分？

第二，退一步讲，即使我们仅用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分析基辛格的外交思想，那么其思想是否囿于物质本体论。国际关系理论界几次著名的论战基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硬核是其物质性本体论。而国内外许多学者将基辛格作为现实主义理论——囿于物质权力内核的典型的代表人物。这就凸显出一种内在的矛盾——为何基辛格的许多理论与实践都突破了物质本体论，而更加注重观念的作用（甚至是决定作用），并展现出某些观念本体论思想的特点（如建构主义）。

第三，再退一步讲，即使我们将基辛格视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那么为什么他的外交实践却并不追求现实主义强调的物质权力的优势——基辛格在任职期间着力推动美苏缓和。又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推动从越南撤军……他的诸多外交行动的重点并不在于削弱对手的物质能力，而在于建构新的博弈规则或是改变对手的意志。离开政府后，基辛格又对美中关系的未来做出了与典型的现实主义学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截然不同的判断。

基于以上困惑，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基辛格撰写的战略理论的原始著作中，重新阅读并分析他的观点，对基辛格外交思想的许多现有

评价进行再思考，试图完成三个任务：

第一，对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在国际关系理论光谱中的相对位置进行更为精确的校准；

第二，尝试着寻找基辛格宏大的战略构想中贯穿始终的政治哲学层面的价值主线，以此编织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有机体系；

第三，将以上结论带入基辛格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加以检验。

通过完成以上三个任务，本书尝试着探索基辛格外交思想中无法完全用现实主义理论概括的更为复杂和深刻的一面。

本书的现实意义：本书虽然是侧重于对基辛格外交思想的理论层面的研究，却对今天中国的外交实践具有现实意义。人类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冲突与战争。中国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的两支重要力量，如何避免英国外交官艾尔·克劳（Eyre Crowe）在1907年的《克劳备忘录》中所描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崛起与英国担忧的历史困境？基辛格对于以核时代与现代通讯技术为特征的人类社会物质新现实的深刻认识，以及他基于这种新的现实而提出的突破物质性权力困境的、更加注重发挥人类观念的能动性的外交思想，将给我们有益的启迪。这是一个紧迫而又长期的命题，本书仅尝试着从对基辛格外交思想的重新思考中，为中美关系的创造性思维提供某种思路。

二、研究现状综述

基辛格，一个许多中国人熟知的美国人。早在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10周年，中美处于敌对状态的时候，世界知识出版社就翻译了他在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此后，从《选择的必要》（1972年）到《美国对外政策（论文三篇）》（1972年），从《白宫岁月》（1980年）到《动乱年代》（1983年），从《大外交》（1998年）到《论中国》（2012年）……基辛格的大部分学术著作和回忆录都被翻译成中文并在国内正式出版。

但与之相比，令人惊讶的是，直到今天国内学术界专门研究基辛

格思想的公开著作却只有两本,^①且都是在近年来出版的。一本是巨永明的《核时代的现实主义:基辛格外交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另一本是龚洪烈的《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与战略》(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而在CNKI数据库中可以查阅到的专门研究基辛格的公开学术文章也并不多,且其中不少是书评而非学术论文。

出现以上奇怪现象并非偶然,而恰恰是源于一直以来研究基辛格所面临的几个束缚。这些束缚正是使当前基辛格研究裹足不前的障碍所在。对于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本书将分四个方面加以概述。^②

第一,意识形态与功利主义的束缚

(1) 对我有利还是对我不利

当我们研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或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接近客观。因为,对于公元前的希腊政治学者,在价值观上,我们无需考虑其政治理想是否符合我们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在利益上,我们也无需考虑其具体政策对我们国家的利弊。然而,基辛格与我们的时空距离相比亚里士多德要近的多。在研究基辛格这位对中国国家利益曾经、正在并必将继续产生影响的美国政治参与者的时候,我们必须有勇气放下眼前的表面的“利益判断”,用更深刻更客观的目光来看问题。“对我有利还是对我不利”作为一个变量,应该被视作研究的干扰项。将“基辛格的某项政治主张是否符合中国当时或现在的价值观”,或者以“基辛格参与的某项政策是否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变量引入到基辛格外交思想的研究之中是没有效用的。

学术研究的意义是寻找那些与研究目的相关的变量,同时过滤那些无关的变量。基辛格外交思想研究的目的,是深刻了解基辛格的外

① 陈有为:《基辛格评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此书开启了学术界系统研究基辛格的先河,但这本著作更多被看作是基辛格的传记,对基辛格思想的评述部分很少,仅集中于本书第五章和第九章)。

② 周一骏:“国内学界关于基辛格研究中的局限性论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交思想并发现其规律，进而将这些规律为我所用。如果我们在研究中无法超脱某些“利益判断”，就无法达到研究目的。然而，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详细阐述这种“利益判断”的束缚。

案例：在尼克松时期推进中美接近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吗？

中美建交，加速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基辛格促成的这个外交革命是符合中国利益的。但是，历史是由不同身份的立场构成的。在中美建交这一历史事件中，中美两国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建交的后果对两国而言也完全不同。在对基辛格研究中，不能因为中美建交符合中国利益，就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也这么想。事实上直到今天，美国国内对此问题也没有完全统一的意见。在深入地研究基辛格外交思想中，我们无法回避类似以下这样的问题：在尼克松时期基辛格推进中美接近是否最符合美国利益？是否存在更有利于美国的时机？如果那不是最佳时机，又是什么因素促使尼克松、基辛格选择那个时机？他们的哲学观与历史观甚至性格对这种选择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基辛格与尼克松倡导与中国建交，由设想变为现实。这完全改变了美国的未来——将美国的对手从一个历史上并不擅长拥有长期战略眼光的急功近利的年轻民族，换成一个拥有巨大创造力与潜力的古老年度。这造成了美国在当今世界舞台上的种种掣肘。尼克松与基辛格为了击败一个没有持久生命力的却是紧迫的对手，唤醒了一个拥有巨大人口资源和数千年文明史的巨人。两人在做出与中国建交以平衡苏联的决策的时候，作为战略家，他们不可能不设想，一个拥有丰富的自然禀赋、人口数倍于美国且拥有传统智慧的国家，一旦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后会发挥出怎样的能量？又可能对美国霸权造成怎样的挑战？

作为受益方中国的研究者，我们应抛开“利益判断”的束缚，深刻且客观地评估“与中国建交”对美国长期利益的影响。应该探究在美苏冷战格局中“继续孤立中国”和“与中国建交”这两个战略，哪个更有利于美国霸权。进而更具体一些，评估诸如中方决定与美建交

后对越南造成的心理影响和对中国国家信用的损失这类的问题。为了探究问题的本质，以服务于更长远的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这些研究是不可回避也无法被取代的。

(2) 对我有用还是对我没用

在国内的基辛格研究中，还表现出一种功利主义——只研究那些看似对我直接有用的战略和政策，而不重视那些看起来“似乎用处不大”的基辛格本人形成这些外交思想背后的哲学历史根源。如果把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分为“道”与“术”，那么今天对基辛格的“术”的研究要远远多于对基辛格的“道”的研究。因为基辛格的“术”——也就是那些直接的全球战略、地区战略，似乎看起来对我们更有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更直接地有用。相比之下，基辛格的“道”，也就是基辛格为何制定这些战略的历史的、哲学的思考，看起来似乎就不那么直接，也不那么有用了。

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一个有趣的现象中：从1957年至今，基辛格主要的著作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本没有译成中文，而这些文章的主题恰恰是与中国无关或完全是纯哲学历史的思考。其中包括《麻烦的伙伴关系》、^①《历史的意义：反思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康德》、^②《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和平问题，1812—1822》。^③

这种现象也反映在有关基辛格的学术研究专著中。在这些专著中，基辛格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观仅仅占很小的篇幅（例如在巨永明的书中，在全书219页中仅占38页；在龚洪烈的书中，在全书358页中仅占31页），而大部分篇章全部用于讨论基辛格具体的地区战略和外交政策。

“术”可以提供直接的政策建议，或者说可以提供立刻可以实施的政策建议，而“道”虽然可以发现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却往往无法

^① The Troubled Partnership, *A Re-appraisal of the Atlantic Allian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65.

^② Henry Kissinger, *The Meaning of History: Reflection on Spengler, Toynbee and Kant*, undergraduate Honor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1950.

^③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 - 182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7.